

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探析

——基于均衡发展视角

彭庆军

(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政治发展序列观认为,可以通过人为设计某种发展序列来促进政治发展。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缺陷。均衡发展作为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另一种可能选择,应该受到重视。对当代中国而言,科学的政治发展应当是均衡发展,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与效能、分权与集权、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发展;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1-0064-08 **收稿日期:**2009-10-25

作者简介:彭庆军(1977—),男,湖南岳阳人,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2008年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YSZ080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显然,科学发展不仅包括科学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包括科学的政治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时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是对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性规定,就其具体内容来说,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本文试图在总结批判学术界主流的政治发展序列观的基础上,对当今中国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内涵进行分析。

一、政治发展序列观及其局限

要研究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就必须首先对现在国内外主流的政治发展观有清晰的认识。当前,对于政治发展的两大基本目标——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学术界并无争议。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怎样实现这些目标。众所周知,发展是一个时间概念,因而就会有一个时间序列。尽管自由主义政治发展观主张民主优先,权威主义政治发展

观主张稳定优先,但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序列过程,认为可以通过人为设计某种发展序列来促进政治发展。他们认为,所有的好事不可能同时发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不例外。因此,在政治发展理论中,序列观是最主要的观点。

(一) 政治发展序列观的内容

序列(Sequence)的英文解释是Succession,而财产继承的继承次序在英文里用的就是Succession一词,因为继承次序是由法律设计、规定和安排的,因此Sequence一词可以理解为一种类似法律继承次序的主观程序安排,这种安排带有一定的优选性^{[1][1]}。如果说先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更多的是一种自生自发序列过程,那么后发国家则更多的是一种人为选择的序列过程。

在先发国家几百年的政治发展历史长河中,其政治发展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但仅仅是普选权的普及,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现代选举制度的国家,直到1970年,英国男女公民的选举年龄才同等地降为

18岁,至此才形成比较成熟的普选制。美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直到1970年和1974年才最终普及普选权。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它们普遍没有这么幸运,从一开始它们就必须面对普选的要求与压力。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扩大政治参与,而是建立政治秩序,建立起有效能的政府。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依次表现为: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大、权力的分散。因此,在亨廷顿看来,只有有意识地选择这一发展序列,才能有效地避免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骚乱与衰退。

派伊在《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序列》一书中的序言中写道,“在求得一个更具意义的历史视角中,我们对危机所历经的不同序列及其所带来的持续性结果变得兴趣勃发。”^{[3]148-152}他认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会依次出现六大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行政命令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与分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就是要依次处理好这六大危机。因此,必须设计出一个解决危机的序列模式,以度过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

罗斯托认为,政治发展最有效的顺序是先建立国家统一,然后扩大行政管理当局,最后是走向政治平等。李普塞特则明确提出,经济发展将会自动地导致政治民主,因此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民主。罗伯特·达尔认为,最好是将政治发展(作者认为是民主化)看成是几次的历史演变构成的。他很明确地分析了通向多头政体的三种序列模式,可是他的分析并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而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板。

总之,在西方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普遍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序列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同的发展目标应有先有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欧阳景根在分析政治发展序列观的理论假设时指出,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有二:一是政治发展的目标的多样性及不可同欲性。政治发展的目标是一个体系,包括民主、平等、自由、效率、能力、分化、制度化、世俗化、官僚化等,但是另一个方面,这些目

标并不能同时或一次性达致,只能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分清轻重缓急,逐次获得。二是各目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目标的优先达致是下一目标达致的先决条件;某一目标的达致程序所付代价成本影响到下一目标或其他目标达致的程度或成本^{[1]11-12}。

事实上,早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之前,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就曾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建国三程序说。继而在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将国家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与后来诸多政治发展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政治制度化优先于政治民主化,先集中权力,然后扩大权力,最后才是分散权力。

既然古今中外,政治发展概莫能外,是否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序列过程呢?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目标的实现就必然会导致另一目标的实现吗?事实证明,政治发展序列观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 政治发展序列观的局限

显然,政治发展是个时间问题,但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生自发的自然过程。人们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是被动地应付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危机,而是要主动选择最佳道路与序列。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序列变量与发展顺序。究竟是自由优先于民主,还是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民主,还是权威优先于自由?无论哪种序列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都有实践的事例为其证明。这恰恰证明人类的政治发展很难找到一种普适的序列发展模式,每一种序列模式在运用到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实践时都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偏差。因为政治发展序列观本身就存在着诸多的局限。

首先,政治发展序列观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为样本,对于后发国家的经验总结不足。西方

发达国家的民主发展大体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按政治发展的阶段进行演变,先建立民族国家,然后扩大政府权力,最后走向民主国家。国内学者李元书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会先后经历以下七个阶段:结束前民族国家状态建立统一的政治一体化的民族国家的阶段,实行集权政治的阶段,实行低级代议民主制的阶段,实行高级代议民主制的阶段,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阶段,人民自治的阶段,最后是社会自治的阶段。而且集权政治阶段是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5]。然而,对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往往一开始就面临着两难困境:不但要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还要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好事不可能同时发生,发达国家在过去二百多年中逐步出现的问题往往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果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有诸多的“后发优势”,在政治发展方面则更多的是“后发劣势”。因此,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样本,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发展序列,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文不对题。以选举权为例,“在1830年时,英国尽管也许是当时欧洲最民主的国家,却只有2%的人口有选举权;这个数字在1867年上升到7%;在1880年,上升到40%。众所周知,在美国,黑人曾长期被排除在选举的大门之外。在瑞士,直到1971年,妇女才获得选举权。”^[6]而我们现在却见不到一个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像这些发达国家一样,在建国初期只给予极少部分人选举权。因为时过境迁,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再重新经历西方国家那样先建立起贵族政治,再过渡到自由民主政治,或不可能先建立和扩大王权,然后再限制或推翻王权。

其次,政治发展序列观中的序列变量,往往只是具体国家的经验总结,很难对其他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做出有效解释。比如《政治发展过程的危机与序列》大体就是以英美国家为例的总结。陈鸿瑜指出:“唯有英国的发展过程较符合危机发生的顺序,如英国最早发生的是民族认同问题,其次是君王制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再次是扩大参与问题,在政治系统整合之后,终会发生分配危机问题。但若干欧洲国家的发展危机则不按上述顺序发生,如意大利和德国在民族国家建立

之前,无需解决民族认同的问题。法国的合法性和整合问题,一直都影响政府的行政绩效,而且加深分配危机。大体而言,欧洲国家的发展危机是重叠和同时发生的,与英国的顺序发生的情形不同。至于亚非国家,则似乎较接近欧洲大陆的经验,而非英国的经验。”^{[3]152}再例如,达尔对通往多头政治的三种序列的分析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走过的道路为蓝本,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已经没有重复选择的可能性。多头政体更多的是对美国式政体的概括,而不是整个西方世界民主政体的总结。

再次,政治发展序列观往往基于一系列的因果假设,即在某一阶段实现某一优先目标往往有助于实现下一阶段的某一目标,可是事实往往并不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政治发展的第一步,权力集中在此时是必要的,但如何保证这些建国者们就不会走向独裁而会继续推动政治发展呢?二战以后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是政治发展的第一步,然而从第一步迈向第二步就步履姗姗、困难重重了。亨廷顿后来也认识到调和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在时段T1趋向目标A的进程与同一时段趋向目标B的进程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在时段T1趋向目标A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期T2向目标B的进程?反过来,在时期T1趋向目标B的进程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在时段T2趋向目标A的进程?”^[7]从某种程度上讲,权威优先于民主并没有错,但如何保证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不自我复制并不断增强而阻碍下一阶段的目标的实现呢?政治发展序列观将其实现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却恰恰相反。任何掌权的个人或阶级都会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因为它不扩大自己的权力,就可能保不住现有的权力。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变成了清一色的军人政权,但这些军人政权几乎很少有主动将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的。正如苏联学者米尔斯基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军人是不会让出政权和‘返回兵营’的,而且只要他们保持团结和相信自己能够对国家实现牢固和有效的统治,谁也不能让他们这样做。”^[8]另外,发展序列可能受到来自模式以外的因素的影响而告崩溃,外国入侵和战争可能破坏或干扰正常的发展序列。因此,政治发展序列观所设想的

“先集中与扩大权力,然后才限制与分散权力的路径”往往遭到现实的嘲讽。

最后,政治发展序列观尤其是权威主义政治发展观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需经历一个权威主义阶段,先发展经济,然后再进行政治民主化。因为在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的统治下可以首先实现政治一体化,避免政治失序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事实上,权威主义在解决政治一体化问题上能力有限。这种以权威主义体制压制大众参与换来经济发展的做法符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情,但仅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成功。在典型的实行权威主义的拉丁美洲,最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交替循环之中。由于权威主义政权不可能完全压制大众参与,总是有一些利益集团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改变游戏规则,谋求自身的合法地位和公开地参与政治活动。这就可能威胁到现在掌权者的地位,并可能改变权威主义的权力结构,因而往往遭到更加严厉的镇压。1964年的巴西和1973年的智利,当局使用暴力镇压手段消除了新兴的对政府构成威胁的利益集团,取缔了全部独立的政党、学生联合会、工会、农协等^[9]。可见,权威主义政权并不必然像政治发展序列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动转向民主政治。相反,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倒退。从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来看,发生种族大屠杀、种族清洗及内乱的国家大部分是专制集权国家。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中许多通过政变上台的专制集权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国家,而是某一个阶级、种族甚至部族、宗教派别的代表。这种将国家机器变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控制工具的专制国家,不仅不会弥补社会本身存在的鸿沟,相反会造成更深的裂痕。可见,专制集权在解决政治一体化问题上也不是想象中那样有效,它只是通过强制手段暂时掩盖了早已存在的问题,随着专制集权的倒台,固有的民族、种族、宗教冲突等就会突现。

总之,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为地设计一个序列来指导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往往适得其反。更何況序列变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与教训,但后发国家无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

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基础的政治发展序列观并不可取,必须换一个思路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

二、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

如果说我们很难为各国政治发展提供一个普遍一致的发展序列模式,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面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时就束手无策呢?既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序列模式发展,是否可以创造出另一种自己的序列模式呢?事实上,政治发展序列观之所以很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套有效的序列模式,其关键就在于当面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时,它忽视了政治发展进程的均衡发展问题,总是试图“单腿支撑”,这既不能持久,又导致反复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原地踏步”的状况。只前均衡发展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

政治发展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重要学派:一是体系功能学派,以戴维·伊斯顿、阿尔蒙德为代表;二是社会进程学派,以伦纳、多伊奇为代表;三是比较历史学派,以艾森施塔德、利普赛特、小巴林顿·摩尔和亨廷顿为代表^[10]。其实,在每一个学派当中,都早有众多学者关注过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均衡发展问题。纵观国内外政治发展研究文献,均衡发展问题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 政治参与扩大化与政治制度化的均衡

尽管亨廷顿认为政治制度化应优先于政治参与扩大化,但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实现二者的均衡。他指出:“参政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均衡问题是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11]因此,尽管他本人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避免使用“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但其最终目标仍然是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扩大化的均衡。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亨廷顿又提出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及自主这五大目标,确认民主与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并对围绕以上目标所形成的相容性假说、冲突理论和调和政策逐一分析,认为在发展目标的选择顺序、调和各项发展目标的制度结构以及推动同时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政府战略的各项政策上难以抉择。即使在

目标的选择顺序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即A目标的实现是否就必定会保证下一阶段B目标的实现?他认为在民主与权威的关系问题上应避免民粹主义的超常政治参与及其对政治体系内聚力的破坏,进而导致参与的“内裂”;同时提防专家治国及其禁止政治参与而导致反政府的参与“外裂”;而应采用“支援性”的政治参与,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间形成良性互动^{[7]331-357}。

(二)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

国内学者时和兴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种多样,各种关系模式的最终解决方案要靠制度,由制度化的规则去对其进行规范。规范关系的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有着不同的方式:或单方强制,或双方协商,或多方均衡。这后两种方式意味着关系各方都有自己的限度,在相互关系中都离不开各种制约,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妥协。即便是单方强制的方式也存在自己的限度,如强制力的限度、强制成本的限度和时间限度等。与回归国家理论有所不同,他着重分析国家自身的限度,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寻求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发展^{[12]序言¹}。

政治发展不是某一方面的发展,研究其互动机制尤其重要。事实上,无论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抑或是欠发达国家的危机,都反映着人类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程度各不相同,影响着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总的看来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是权力与自由的矛盾(权力层面)。其二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行动层面)。其三是权威与服从的矛盾(权威层面)^{[12]105-107}。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都不可偏离,以上三种矛盾的解决不能仅仅是权力压倒自由,效率优先公平,权威高于服从。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既要承认国家对于社会的作用,又必须强调在社会力量作用下国家作用受到的限制。因此,从宏观上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是一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三) 政治效能与政治民主的均衡

施雪华教授在《比较政治现代化》一书中提出,发展的政治稳定是转型社会现代化的钥匙。要实现发展中的政治稳定,必须在政治效能与政治民主之间求得均衡。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依

赖于政治体系积极适应外在环境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自然系统、国际系统)的变化,与环境系统保持动态均衡;同时,政治系统本身应当以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均衡去适应外在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要求。在种种内外因素中,政治效能和政治民主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两大关键的价值因素^[13]。

另外,陈建兵在其硕士论文《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一种政治发展研究视角》中特别提出,在人类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的“悖论”,而要走出“悖论”,就要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的均衡包括结构均衡、功能均衡和动态均衡。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自由主义政治现代化理论和权威主义政治发展理论解释力的局限及政治发展新主题的凸显,要求确立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均衡研究视角,将政治发展过程看成是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均衡的过程^[14]。

(四) 政治体系的系统性均衡

体系功能学派大多将政治系统看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有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首先要保持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均衡。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是要求的容量和内容之间相互关系的函数,另一方面,亦是对于满足和处理这种要求的系统做出的适当反应的函数^[15]。输入与输出之间出现不均衡,就会给整个政治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从而影响到政治系统的稳定。另外,政治系统的输入既包括“支持”,也包括“要求”,而在“要求”与“支持”之间也应保持大体均衡。阿尔蒙德提醒人们,“输入流程的量的下降,支持输入和要求输入之间发生的不平衡,或是要求中发生的某种重大变化,这些也可能会导致消极或倒退的‘发展’。”^[16]而且,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分化一向被誉为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结构分化与功能分化也应保持大体均衡。

(五)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均衡

在政治发展(尤其是在民主化)问题上,人们一直关注国家机构的改造。要求约束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一条思路就是实现国家与政府的退却(retreat)。当人们意识到同样适用于个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利己主义”原则不可能使国家和政府在关键问题上自动让权让利的时候,又

三、均衡发展视角下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内容设想

把注意力放在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上,期望通过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启蒙教育)来“击退”国家与政府的强权^[17]。因而,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就有必要注意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均衡问题。确实,如奥尔森所言,社会繁荣来自于各种关系的均衡发展,尤其是来自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均衡。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依赖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没有政府的权力,就不可能存在私人财产权等个人权利保护问题。因此,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均衡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六) 民主与法治(或宪政)的均衡

怀仵志认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是沿着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分别形成了“民主优位”和“法治优位”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时间里逐渐走向融合,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并没有消解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冲突,而是依然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保持着均衡与张力^[18]。在宪法学界,信春鹰也认为:“在过分强调民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过分强调宪政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都已经暴露出严重缺陷的现代社会,在民主和宪政之间保持均衡的宪政民主制度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所能设想的一个相对理想的选择。”^[19]如果说过去发达国家可以选择“民主优位”或“法治优位”的模式,那么,当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则是民主与法治相融合的世界,在民主与法治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

总之,尽管以上不同的学者所分析的均衡内容并不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时序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寻求动态的政治均衡的过程。因此,研究政治发展,就不得不重视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均衡问题。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好事不可能同时发生,但坏事往往同时发生。不管各国在其政治发展过程中注重以上学者们所提出的何种均衡,均衡发展应该是其现实的路径选择。遗憾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总是简单地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分权制衡体制来解决其政治发展问题,以分权制衡的体制代替均衡发展的路径,因而在政治发展上总是原地踏步甚至后退。

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当前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为了政治稳定而忽视民众的政治权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为了扩大政治参与而不顾政治稳定。因此,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在现实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其政治发展应该也是一个不断寻求均衡发展过程。但是,与其他后发国家比较而言,除了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共性之外,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是均衡发展,但均衡发展的具体内容则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

(一) 从政治价值上看,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效能的均衡发展

政治发展本身并不是价值无涉的。政治发展作为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正向的转变过程,既包括国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量与质的提升),也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公民权利的扩展及受保护程度的提高)。而所谓“正向的转变”,是与政治衰朽与专制集权相对应的。因此,在国家发展方面,不仅是指国家权力的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提高。这种“质”的提高,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的有效化。在社会发展方面,不仅是指公民权利的扩大,而且也包括公民权利的受保护程度的提高。公民权利的扩大要求民主,而公民权利要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又离不开国家的效能。即使是民主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这一关系也仍然存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其国家权力的民主化程度及公民权利的受保护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与公民权利的扩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国家权力的有效性及公民权利的受保护程度则反映其政治效能。因此,从价值原则上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仍是一个不断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效能之

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

(二) 从政治体制上看,应该是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发展

在一个政治体系内,价值是体制的内化,体制是价值的外化。政治体制是政治价值的承载者,没有政治体制,政治价值就会成为空洞的价值。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要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保持“民主”与“效能”的价值性平衡,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集权与分权平衡的政治体制的构建。民主要求分权,但不一定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效能要求集权,但不一定是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体制上的权力制约,就不可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更谈不上国家权力的民主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现代国家必须提升自身的效能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这就要求一定的集权,尤其是行政权力的集权。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这就既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分权(如正在试点的行政三分制改革),释放更多的社会参与渠道来化解矛盾与冲突;同时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集中,来控制矛盾的激化与转化。因此,从均衡发展的视角看,在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还必须同时在“分权”与“集权”之间保持平衡。

(三) 从政治行为上看,应该是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的均衡发展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发展的“民主”价值原则要求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而政治发展的“效能”价值原则又要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能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国家权力的发展不仅是国家权力“量”的增多,而且是“质”的提高,这种“质”的提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效能。由于政治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就是政治参与扩大化,伴随政治参与扩大化所要求的提高国家权力效能的主要表现就是调控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当前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及利益矛盾的增多,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成倍地增长。这就需要开拓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将其纳入合法的政治参与范围之内。但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现存的政治参与渠道有限及传统政治心理的影响,目前诸多政治参与非常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这就要求国家加大调控力度,增强其自身的政治控制力。因此,在政治行为上,政治发展过程还将是一个不断寻求

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的政治控制之间的动态均衡的过程。

总之,从均衡发展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求均衡发展的过程。在政治价值上表现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效能的均衡,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分权与集权的均衡,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参与与控制的均衡。价值、体制与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当然,绝对的均衡是不可能的,但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应致力于追求价值、体制与行为的均衡发展。即使是发达的欧美诸国,其政治发展也仍在对均衡的寻求当中。这诚如威亚尔达在分析欧洲政治发展时所指出的“公民不能放弃政治,而民主政府需要市民社会。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它所经历的第三个世纪里仍将是一个寻求平衡的行动”^[20]。

参考文献:

- [1] 欧阳景根. 政治发展理论的序列观评析[D]. 中国人民大学,1999:11-12.
- [2] 亨廷顿 P S.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4-5.
- [3] 陈鸿瑜. 政治发展理论[M].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148-152.
- [4] 孙中山.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M]//曹锦清. 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8-250.
- [5] 李元书. 政治发展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2-39.
- [6] 布公. 为什么民主必须是自由的[M]//刘军宁.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8.
- [7] 亨廷顿 P S.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 罗荣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47.
- [8] 米尔斯基. “第三世界”:社会、政权和军队[M]. 力夫,阜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7.
- [9] 陈尧. 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 [10] 格林斯坦 I F, 波尔斯比 W N.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 竺乾威, 储复耘,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
- [11] 亨廷顿 P S. 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M]//布莱克 E C. 比较现代化. 杨豫,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81.

- [12] 时和兴. 关系、限度、制度: 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3] 施雪华. 政治现代化比较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567.
- [14] 陈建兵. 政治民主与政府能力: 一种政治发展研究视角[D].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1-5.
- [15] 伊斯顿 D.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81.
- [16] 阿尔蒙德 G A, 鲍威尔 B G Jr.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M]. 曹沛霖, 郑世平, 公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6.
- [17] 燕继荣. 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82.
- [18] 佟怀志. 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及其均衡——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初探[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4(5): 39-46.
- [19] 信春鹰. 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均衡[M]//夏谦.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245-249.
- [20] 威亚尔达 H.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 榕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7.

(责任编辑: 杨凤春)

Balanced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the Scientific View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PENG Q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Many theories hold that people can plan some kind of artificially designed sequence to enhanc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has many flaws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o a balanced development as an alternativ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cientif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a balanced one, includ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effectiveness, decentral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Key Words: t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balanced development

(上接第 11 页)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 Consump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Barro-Ricardo Equivalence

XU Xian-p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consumption under the 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It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 consumption depended on the CRRA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government spending. We also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hines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 consumption empirically, and found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as complement with private consumption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 active fiscal policy in China seems to be effective. In the long run, the private consumption will be crowded out b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o the expenditure policy was not suitable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s.

Key Words: government spending; consumption; Barro-Ricardo Equivalence